

抗戰小叢書

# 我們抗戰的領袖

潘公展著

中國文化建設出版社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公用圖書  
愛惜使用

潘公展著

抗戰  
小叢書

我們的抗戰領袖

商務印書館發行

~~000000~~



## 本叢書發刊旨趣

中華民國對敵人已展開血的搏鬥，中華民族已進入了空前的大時代，我們應當怎樣去加緊磨鍊，加緊努力，以期對國家民族的大時代有所貢獻？

現代戰爭是全民族的戰爭，也就是整個國力的對比，所以戰事一經發動，每一個國民應該都是國家的戰鬥員，不論是武裝的或非武裝的，每一種貨物都是國防的必需品，無論是否直接屬於軍需，而最後勝利與失敗的判定，即繫於全國人與物總和後實力的強弱。我國近百年來，內有封建殘餘的壓迫，外有帝國主義的欺凌，國防實力，喪失殆盡；惟四萬萬五千萬的龐大民衆，任何強暴，猶不能輕視。現在前方浴血抗戰的忠勇將士，已使敵人遭逢意外的挫折，祇要吾後方四萬萬五千萬民衆，人人抱着共赴國難的決心，則最後勝利，必屬於我。

不過民衆的力量，有如地下的寶藏，不去開發，必無所得；故努力於民衆潛在力的發揚，亦是當前重要的抗戰工作。



發揚民衆的潛在力，最迫切而需要的，就是灌輸抗戰的知識和技能，藉以引起抗戰情緒，充實抗戰實力。現在的出版界，對於抗戰各方面人人應讀的系統整套書籍，畢竟還覺得太少，本叢書的出版，就是要補救這個缺點。我們希望全國民衆人人都有應付進入大時代的必要常識，故在各種學科各種問題中，提鍊出新的滋養，貢獻些新的啓示。下列二個目標，便是中國文化建設協會編纂本叢書的要旨：

甲、本叢書以民衆在抗戰期內，人人應有之知識技能爲準則，除供全國民衆閱讀外，並供宣傳人員，中小學校教員及大中學校學生參考閱讀之用。

乙、本叢書重示實例的提示，不單偏於理論的研討，對於抗戰上必需的常識與技能，作有系統的介紹，對於當前急求解決的問題，作有計劃的解答。

最後，關於本叢書的設計編纂及徵稿出自陳端志、袁哲兩同志的協助爲多。各作家又能在短時期內，百忙之中，共同完成這大時代中抗戰文字的基礎工作，都是使本會和本人非常感謝的。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一日中國文化建設協會書記長潘公展序於上海

# 目次

第一章	我們的領導者——領袖	一
第二章	領袖的認識	六
第三章	怎樣領導我們抗戰	二二





# 我們的抗戰領袖

## 第一章 我們的領導者——領袖

【神聖的民族抗戰】自從敵兵在蘆溝橋啓釁以來已有三個多月了，「八一三」上海抗戰至今也已二個半月，我們爲了保障主權的獨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維持民族的生存，以及世界的和平起見，已經發動偉大的神聖的民族抗戰，和殘暴的侵略者決一死戰了！

在南北二大戰場發動抗戰以後，敵人更滅絕人道，在我國各地任意轟炸非戰鬥員，殘殺無辜平民，破壞水陸交通，敵艦更騷擾沿海各地，全國均已入於戰時狀態，任何一地，任何一人，除了漢奸以外，都和敵人勢不兩立了！

現在我全國各地雖然受着敵人的侵略威脅，人民的生命財產雖然受着敵人的殘殺破壞，但國民非但毫無怨言，而且益發增強了敵愾心，人人願意爲國家民族的光榮而戰死，沒有人願意中

途投降敵人而淪爲奴隸。這種全國上下齊心一致，同仇敵愾的精神，非但是民國以來所未有，簡直是中國自有歷史以來的第一次！

【偉大的最高領袖】 國民這種同仇敵愾的心理，這種上下團結一致對外的精神，固然是被敵人的侵略所加強；但是，人民的心理如果沒有一個中心的思想，沒有一個偉大的信仰以及正確的行動以爲指標，那麼雖然有同仇敵愾的心理和對外一致的精神，這種心理一定容易動搖，這種精神一定容易渙散，抗戰也依然不能持久！

我們現在當全面抗戰發動以後，這二三月間，全國上下所以能團結得比以前更爲堅固，表現得比以前更爲堅決，沒有一絲一毫紊亂的現象，沒有一分一釐妥協的空氣，這完全因爲有我們的最高領袖 蔣委員長作我們的中心指導者。現在全國上下只記得 蔣委員長的談話：『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的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因此現在再沒有人幻想着和敵人妥協，每個人都準備和敵人作長期而艱苦的抗戰！

【有領袖纔能抗戰】 領袖對於抗戰的前途爲何這樣的重要呢？

在平時，我們也必需要有一個領袖來作建設國家的領導者。領袖的所以重要，正如船上的舵和機器的發動機一樣，國家如果沒有領袖，必致羣龍無首，不知所從。而且我們中國是一個弱國，人民一盤散沙，政治機構和社會組織均不健全，如果沒有領袖來作政治社會各方面的中心人物，國家必定陷於紊亂。因此領袖的所以重要，第一，可以統一我們的意志。領袖的思想，即是我們全民族的思想，領袖的意志，即是我們全國人的意志。無論領袖的一篇演講，一篇談話，都可作爲我們全體人民共同意志的表現，共同思想的結晶！領袖是我們國家民族的代表者，是國家民族的人格化！因此我們有了領袖，全國的意志必然能夠統一，共同團結在領袖的意志之下，作國家民族的建設工作。

第二，可以統一我們的行動。外人以前常常批評我們中國沒有組織，社會的秩序散漫，主要的原因是爲了沒有中心人物，沒有領袖。國民既沒有一個行動的規範，沒有一個行動的目標，那麼如何能團結起來，如何能從事建設呢？近年來我國有了很大的進步，即外人也交相讚譽，那完全是我

國在偉大的領袖領導之下，行動統一，步伐整齊所收到的效果。所以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必須要有領袖，那是毫無疑義的了。

我們再從別的國家來找一些例子：大凡一個民族在艱難困苦中創造出來的，那個民族中間一定有一個偉大的領袖為領導者。如美國之有開國元勳的華盛頓，解放黑奴的林肯，以及現在主持復興政策的羅斯福三位總統；俄國有革命領袖列甯以及現在的繼任者史太林；土耳其有民族革命領袖基瑪爾，領導着土耳其人將土耳其從艱險困苦中復興起來，甚而至於法西斯國家，如意大利之有墨索里尼，德意志之有希脫勒，也都是領導着他們的民衆從艱苦中奮鬪着。凡此種種，都是我國很好的例子，而使我們認識領袖對於國家民族的重要。

【領袖是戰時主帥】現在我們中國是在外敵侵凌之下，國家已在危急存亡的時候，領袖在這個時候所負的責任是越發重大，而國家需要領袖也越發深切。一個領袖在平時要做政治、社會的領導者，在戰時又要做全軍的統率者。德國的軍事學家魯登道夫將軍在全民族戰爭論中有論主帥的一章，他說：『凡是一位勝任主帥的人，應立於最高的地位，否則對於戰爭有害而無益。惟有

居於最高的地位，他的行事乃有統一性和強力性，而後能殲滅敵人，以維持民族的生存。他的行事範圍，無所不包，正如全民族戰爭之無所不包。關於國民生活的全部範圍以內，主帥爲其決定者，主帥的意志，卽爲一切的標準。」又說：『主帥既鞠躬盡瘁於戰局之中，同時須以遠大的眼光顧及軍民生活之全部，此軍民生活之全部，爲全民族戰爭的基礎，不獨觀察之而已，更須深入其中而體驗之。』又說：『主帥之所以爲主帥，領袖之所以爲領袖，乃至軍人之所以爲軍人，皆須視其品格而定，其品格上所應具備者至廣而至嚴，比較知識尤爲重要。軍隊中所需者，決非鑽營奔走這些人，乃具有堅強品格的人們；有這種品格的人，方能得部下的信仰。』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在戰爭時期的主帥必須由全國的領袖來擔當方可勝任；因主帥非特要具備軍事的知識，更重要的須具有完善的品格，遠大的眼光以顧及軍民生活的全部。如果平時國民所愛戴的領袖與戰時將士所服從的主帥，能合而爲一，則最與全民族戰爭的理想相符，而我們的領袖——蔣委員長，平時既受全國人民的愛戴，本爲全國的最高軍事統率者，這次起來領導抗戰，自然是最適宜而爲全國所熱誠擁護的了！

## 第二章 領袖的認識

領袖必須具備領袖的條件，領導抗戰的領袖更必須審察內外，計劃週詳，配合主觀和客觀的力量，以求民族的獨立自由與解放。所以為平時的領袖既不易，作抗戰的領袖就更非常人所可及了！

這裏，我將我們的抗戰領袖——蔣委員長的人格和德性作一分析，以便加強國人對於領袖的認識。

【領袖的堅決意志】 為領袖者必須具有堅決的意志，方能成就偉大的事業。我們的領袖對於事理看得十分清楚，既看清楚之後，就毅然實行，決不因循猶豫，這是領袖英明果斷的地方，也是一個領袖所必要的條件。

領袖曾說：『一個人幹事要有決心，錯了就讓他錯；因為，決心而錯，比之猶豫不決還要好。』可知領袖意志的堅決和處事的果斷了。

又在黃埔時曾對第三期入伍生訓話說：『總理平時教訓我的話，最要緊的，就是凡有主張，皆要處在極端的地位，決計不肯妥協調和，就是寧爲玉碎，不願瓦全，這是總理對我常說的話，我們以後什麼事都要照着總理的教訓做去。都要立在極端的一邊，不要立在中間，做徘徊歧路搖撼不定的形狀。』

領袖這種遇事不妥協，英明果斷的性格，一方面是天生的，同時也是繼承總理的堅強性格而來的。他在辦理一件事的時候，先則審察情勢，考慮周詳，但一俟決定以後，便馬上堅決實行，無論誰都阻止不止，任何艱難困苦均所不怕。他在軍校第一期同學錄的序文中說：『古人云：「不爲聖賢，便爲禽獸。」余更續數語曰：「不爲信徒，便爲叛逆。」更進一言曰：「不爲同志，便爲寇仇。」蓋天下事不是則非，理固然也。吾今特告全校未亡之諸生將士曰：如吾輩不能勇往猛進，打破此帝國主義及其傀儡之軍閥，實行我總理三民主義，以繼承先烈革命未成之志，則在同學之情感言，不啻爲敗類，在同志之公義言，無異爲叛逆，爲寇仇，且將淪爲禽獸矣。主義不行，黨員之恥，本校師生同志之死，乃爲實行主義而死，爲雪恥復仇而死，爲求我民族之獨立，民權之平等，民生之自由而死，爲

正義人道而死，爲繼續先烈之生命而死。若我本校未亡之同志，視已死同志之死如秦越，而不引以爲恥爲仇，不能以實行主義爲己任，則我已死之同志之死，可謂非死於敵手，而實爲吾輩未亡者不負責不盡職之僞同志所陷害也。蓋不負責不盡職者之禍害同志，實甚於作壁上觀者之中立派，及與我對敵者之寇仇也。』因此領袖致力革命數十年，立定志向，做 總理的忠實信徒，未嘗有一絲一毫的動搖和懷疑。從掃蕩叛逆，實行北伐，打倒軍閥，完成統一，終結第一期國民革命之使命，始終勇往直前，毫無反顧，認定目標，堅毅邁進。卽對此次抗戰，始則忍辱負重，努力準備，及至和平絕望，則毅然決然實行抗戰，此種大智大勇，實爲 總理以後的第一人！

【領袖的犧牲精神】 我們領袖的犧牲精神可說是任何人所不及的。凡事只須和國家民族有利，他就毅然決然地犧牲一己的利益來爭取國家民族全體的利益，領袖是最具有捨己爲人，捨身爲國的精神的。他常常訓誡部下說：『要向着最危險的路途急進，要刻苦自勵，因爲革命黨人，是非常的人，而且革命本來就是一種冒險犧牲的事業。必須向着最危險的路途急進，才會成功，又必須刻苦自勵，始終不懈的奮鬥，一切纔能取得最後的勝利。』又說：『生活的目的，究竟怎樣呢？爲個



人的升官發財嗎？想做英雄好漢嗎？若以此爲目的，那就不要來革命了，還講什麼生活目的呢？我要問我們是不是人，人是不是成類的？一個人生在人類中間，如果只管自己有得吃，有得穿，有得住，有得用，不管其餘我以外的幾千萬萬人，究竟有沒有吃穿住用，這樣儘管你自己有得吃穿住用，終竟是不成的。那麼，生活的目的，究竟怎樣呢？只有一句話，就是「增進我們人類全體的生活」，這纔是真正生活的目的。我們革命不是爲個人，乃爲增進人類全體之幸福。所以生活的真正目的，可以說不是爲個人求自由平等和幸福，並且要犧牲個人的自由平等和幸福，以求人類全體之自由平等和幸福。」又於二十四年六月三日在成都擴大紀念週時訓話說：『凡是遇着艱難，有責任自己先負，勞苦的工作，自己先做，危險的地方，自己先去，一心一意，願爲主義爲革命爲國家民族來犧牲。因爲我的腦筋裏只有「犧牲」兩個字，再沒有其他的東西。』這二節話是可以代表領袖的整個人生觀，也是每一個革命者所應有的人生觀。

領袖勇於犧牲的精神，隨時隨地都可舉出例子。在北伐時，他往往冒着彈雨，親臨前線去督戰。在總攻武昌的一夕，他親到火線上去對部下訓話，經部下勸阻都不聽，以後歷次戰役，他都常常親

臨前線指揮。有一次最危險的時候，領袖督率部隊在南城剿匪，晚上宿在前線，和敵人的部隊僅僅相隔數里，不料到了半夜，敵人前來偷襲，猛烈的槍聲愈來愈近。領袖急忙推醒夫人起牀，那時衛兵已經進來報告，敵人甚多，且來勢甚猛，領袖當此萬分危急的時候，一方面立刻調遣部隊和一部分的衛兵前去應援，一方面和夫人的手裏都緊握着手槍，將重要的文件都投入火中，以作萬一的準備。後來一直到了天明，方將敵人擊退。再有一次，就是去年的西安事變，這是國人大家所曉得的。在西安事變發生以前，領袖早已聽到張學良等有不穩的企圖，但爲了國家民族的利益，仍躬冒危險，不惜犧牲，飛到西安，對張楊的部隊訓話。及至事變發生，領袖仍臨難不苟，大義凜然，叛徒終不得不爲之屈伏。領袖是有此種偉大的犧牲精神，所以部下個個信服，人人效死，都是領袖的精神感召有以致之。

但是，犧牲一己的生命以取得國家民族的利益，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尙不乏其人，唯有高瞻遠矚，計劃國家的百年大計，抱定主張，不計任何毀譽，這種犧牲可說是最難的犧牲。我們知道自從九一八事變以來，國內一部分人對於領袖頗多誤會，以爲政府不肯抗戰，殊不知領袖此時咬緊牙

關，堅苦卓絕，正在積極準備抗戰。如果徒憑一時意氣，毫不準備的抗戰，在領袖個人當然無疑的馬上可以成爲民族英雄，博得民衆一時的痛快，但將國家民族的命脈斷送了。關於此事，領袖會在總理紀念週時說：『關於抗日的事情，假如本人要想全國國民擁戴我，是最容易做得到；只要我對日宣戰，全國國民一定是稱贊我，把我抬舉得很高。但我爲什麼不這樣去做，反給一般人疑我不抵抗呢？我不是怕死；我不能把國家的命脈送斷，不能使民族的生存危殆。我現在要爲國家前途打算，要爲民族前途着想，不能爲個人名譽而使中國滅亡。』

現在政府是實行抗戰了，在這二三個月中間，我們痛切地感到，我們的準備有許多點實在還覺得不夠——無論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但是幸而全國團結一致，萬衆一心，方能得到現在的情勢。現在全國上下當然已經明白領袖的一片苦心，但在前幾年領袖對外既要忍辱負重，受盡強寇的壓迫威脅，對內又爲一部分民衆所誤會，那種爲了保全國家的命脈和民族的生存，苦心經營，不顧外界的疑謗，不受任何的阻礙，這種偉大的犧牲，可以說把自己的全生命完全融化在整個國家民族的利益之中了！尤其在已經實行抗戰的現在來看領袖幾年來不計一切毀譽，含垢

忍辱，埋頭苦幹的犧牲精神，是更值得我們的崇拜與敬仰。

【領袖的凜然氣節】我們的領袖是具有凜然不可侵犯的偉大的氣節，這種氣節是我中華民族的靈魂，是我中華民國的國寶！我們中華民族具有領袖這種偉大的氣節，中國是決不致滅亡，民族一定能復興！

關於民族的氣節，領袖常常訓導我們要『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領袖認為只要我們國民個個都懂得禮義廉恥，而能力行之，那麼中國一定有救，民族一定能復興！

領袖的凜然的偉大的氣節，臨難毋苟免的精神，在去年的西安事變中表現得最真切了。現在將領袖的西安半月記中的日記摘錄一些在下面：

十二月十二日的日記中有云：『余身可死，頭可斷，肢體可殘戮，而中華民族之人格與正氣不能不保持。余今日身在爾等叛逆之手，余即代表整個民族四萬萬人之人格，人格苟有毀傷，民族即失其存在。爾以余爲威武所可屈而向汝叛逆降服乎？今日之事，爾有武器，我有正氣；我雖無武器，須知正氣與喉舌即爲余之武器。余必捍衛民族之人格，而求無愧爲總理之信徒，無負於革命之先

烈，亦必無負於生我之天地父母與全國國民！」

十二月十四日的日記中有云：「義之所在，不奪不搖，生命可犧牲，而正氣與主義不可犧牲，能保存高尚之人格而死，則精神永遠不死，自有無窮之繼起者秉此正氣以擔當國事，此則所謂「我死則國生」也。」

又在十二月十五日致夫人函中云：「余決爲國犧牲，望勿爲余有所顧慮，余決不媿對余妻，亦決不媿爲總理之信徒。余既爲革命而生，自當爲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體還我天地父母也。」

又在對張楊訓話中說：「吾人無論何時應視國家之生存高於一切，應認定國家必須生存，個人不足計較，尤須知人格必須保全，民族乃有基礎。故吾人之生命可以犧牲，而國家之法律綱紀不能遷就，身體可以受束縛，而精神之自由絕不能受束縛。」

我們知道，那時領袖是被困在西安，在張學良軍隊的劫持之下，如爲個人的安危及利害計，祇要簽一個字，答應他們的要求，則個人之被困即可解除；但領袖的心堅如鐵石，對於張楊的無理要求，最初是置之不理，繼則嚴詞拒絕，因爲領袖認爲：「無論個人與國家民族，如人格喪失，則雖生猶

死，雖存必亡。』這種偉大的臨難不苟的精神，凜然不可侵犯的氣節，除了總理以外，在歷史上是罕見的。中國過去也有許多稱爲大人物者，在臨難的時候往往屈伏，等到事後再行否認，說那是被迫承認，應作無效，但在人格上總不免留下污點了。

領袖的這種精神與氣節，是我國家的至寶，是民族復興的動力。須知在此全國抗戰時期中，我們的國家民族與青年們個人所將遭遇的危難，正不知其尙有若干，均須待我們用「臨難毋苟免」的強毅精神去克服他，否則不但我們自己不能學到領袖一樣做成「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並且將使我們的國家與民族的復興也要受到重大的打擊！

因爲我們的領袖具有這種偉大的氣節，所以自從發動抗戰以來，南北二地不斷地發生了許多可歌可泣偉大壯烈的犧牲：在南口既有全團殉國的將士，晉北又有郝軍長率部的壯烈犧牲，寶山既有姚子青營全營的與城偕亡，閘北我軍撤退的時候，又有八十八師的八百官兵死守陣地，與暴敵作決死的抗戰！這種種都是我民族浩然正氣的表現，也正是我領袖的凜然氣節感召所致。

【領袖的寬大胸懷】 這幾年來，中國是在空前的國難之中，內則不能團結，外則強敵侵凌，但

我中華民國在領袖的領導之下，埋頭苦幹，衝破了種種困難，腳踏實地的從事於復興民族的工作。這中間，敵人的挑撥離間不必論，就是國內失意政客的肆意造謠，幾無一不想中傷我們的領袖，但我們的領袖從不和他們去計較，去辯論，終是以至誠來感人，以事實作答覆，咬緊牙關，忍辱負重，爲國家民族求真正的生路。至於對中央有能諒解的人，祇要他們能真心覺悟，翻然改悔，領袖無不寬容接納，不究既往；從無睚眦必報，「以牙還牙」的。稍一檢閱北伐誓師以來的十年歷史，就可知道此語之非虛。這是因爲領袖完全以國家民族爲重，不以個人的利害得失縈心；這是領袖的所以偉大，也就是領袖之所以能負荷復興中國的大任。尤其是在最近的幾年，國難日益嚴重，領袖深知非團結無以抗敵，非統一不能禦侮，故以最大的努力，以最堅的忍耐，企求全國的統一團結，如苦心以求兩廣事件的和平解決，對於西安事變罪魁的寬容，都可表現領袖絕不計較一己之恩怨，處處以國家民族之利益爲前提。

蔣夫人在西安事變回憶錄中曾說：「當其推進剿共軍事之時，仍注重於招撫投誠，開其自新之路。共黨或被感動而來歸，或被俘而勸服，即分送各處反省院，衣之、食之、教育之，使瞭解行政上種

種革新，實皆爲大衆求生活之改善。此卽新生活運動之所以能奠定廣大之基礎，而贛省農村運動之所以有今日顯著之成效者也。」在西安事變中當張楊二人真心表示悔悟以後，領袖立即接受他們的悔悟，而且表示：『現在爾等既表示悔悟，則余可請求中央必仍本愛惜國力之精神，自有妥善處置，以挽救國家之危機也。』又云：『現在國家形勢及余救國苦心，爾等均已明瞭，余生平作事，唯以國家之存亡與革命之成敗爲前提，絕不計及個人之恩怨，更無任何生死利害得失之心。且余親受 總理寬大仁恕之教訓，全以親愛精誠爲處世之道，絕不爲過分之進求。』

領袖既具有此種寬大的胸懷，他的部下和人民自然對他人人敬仰，個個愛護，因此他可以成就偉大的事業，而作全國抗戰的領導者。

【領袖的至誠德性】 講到領袖的德性當然很多，但是可以一個「誠」字來包括之。他待人以誠，處事以誠；對國家民族是誠，對部下及人民也是誠。戴季陶先生曾說：『總理一生閱人多少，爲什麼到得晚年，獨從羣衆當中，認出一個蔣先生，用盡平生之力，扶植提攜，保育鼓勵，使他成就近十年中的大事業？爲什麼斷然把黨國的重任，獨放在蔣先生的肩頭上？ 總理的眼中，到底看見了甚



麼？我確實知道：決不是爲的才學，爲的技能，爲的聰明智慧，更不是爲的主張思想；要知道這些東西，到得真正當大事的時候，件件都用得着，卻件件都用不了。飯是人吃的，衣是人穿的，屋是人住的，路是人走的，如果人不成，便件件都沒用。總理眼中所看出的，明明就是一個至至誠誠行忠行孝的蔣先生。只這至誠是可以挑得起萬斤擔子；只這忠孝是可以托得住萬人的性命，負擔起千萬年的歷史。在電光石火中尋生活，不是至誠不息的鐵漢，如何靠得住？」

關於「誠」字，領袖自己已有比較詳細的說明，他在黃埔第三期的同學錄序文裏說：「甚矣，「親愛精誠」之校訓，不可須臾離者也！子思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誠則「親」，誠則「愛」，誠則「精」，而誠則成矣。未有不誠而能實行三民主義者也；亦未有不誠而能實行共產主義者也；未有不以誠對三民主義者，而能以誠對共產主義者也；亦未有對共產主義以誠，而對三民主義不誠者也。」原來親愛精誠是軍校的校訓，領袖每對學生訓話時，總是詳細講解親愛精誠的精義，而尤其着重於「誠」，因爲有了誠，親愛精方能發揮出各自的力量。

領袖又說：「吹毛求疵者，不誠也；鉤心鬪角者，亦不誠也；未有不誠而能避免衝突與分裂者；亦

未有衝突與分裂而其革命能成者。是故不成者，不誠也。』由此我們可以知道，領袖之所以能成就偉大的事業，所以得到全國人民的愛戴，可說完全得力於「誠」字。待人是誠心誠意，做事是誠心誠意，那麼事情便沒有不成功的道理了。

領袖又云：『歧視者，不誠也；逆臆者，亦不誠也；己先不誠，而徒責人以誠，難矣！是故誠者無所往而不誠，不誠者無所往而能誠者也。』歧視者就是異樣的看待，同在一個團體中對於各個份子不一律看待；逆臆就是徒憑一己的情感與意氣，發生愛惡而作判斷，其結果，往往就是處事不公平，難得他人的信服。領袖認為這種歧視與逆臆，也是不誠的原故，因此他數十年來統率軍隊，對待部屬，從無怨言。即去年西安事變中，張學良始則懷疑領袖對待東北軍有歧視的地方，後來看到領袖的日記，方才消釋誤會而感奮，如果領袖對於東北軍果有所歧視逆臆，那麼張學良也決不致悔過如是之快，而西安事變之解決也決不能如是神速，張學良更不會親到都門請罪了。這都是為領袖大公無私的至誠所感化所致。

關於誠字，領袖在黃埔第三期同學錄的序文中有更詳盡更透闢的言論：『第三期同學行將

畢業，丐余以同學錄之序言，余今因追悼陣亡將士之有感，故錄此以慰其乞序之殷；並以此勗我第三期之同志，使其知革命之學之大，革命之理之精，尙不外於吾「親愛精誠」之校訓。不親則離，不愛則妒，不精則雜，而不誠且無以致親致愛與致精也。誠則明，誠則強，誠則金石且爲之開，而況於人乎？況於同志乎？吾同志其勉旃！

【領袖的樸實生活】 領袖的生活，簡單以一句話包括之，就是「簡單，樸素，迅速，確實。」他律己惟嚴，個人的私生活極爲嚴肅。唯其律己嚴，纔可使部下悅服，纔可爲國民模範，也纔可領導國民對暴敵作堅苦而持久的抗戰！

現在我們先來說一說領袖的日常生活。他的日常生活是極有規律的：每天黎明即起，起牀後即開始辦事，如草擬重要計畫，起草重要文稿。八時早餐，餐後即會客。這時所會的客，都是很重要的，或是聽取報告，或者面授機宜，以後即出席會議。一時左右午飯，飯後午睡片刻。三時以後，或是開會，或是會客，或者批閱重要文件，閱讀書報。五六時以後，常常和夫人出外散步一小時，七時後晚餐。餐後仍是批閱公文，或是私人研究學問，閱讀書報。睡眠常在十一點以後，有時甚至在十二點或一點

左右。

領袖每日工作時間常超過十二小時，自從發動抗戰以後，各方事務更爲緊張繁劇，工作時間常超過十六小時，甚至二十小時。

領袖的生活可說隨時隨地合乎新生活運動的標準，衣食住行，都合乎禮義廉恥的規範。領袖的衣，只要整齊清潔，不事奢侈浮華。他出外常穿軍服，在家則穿便服。無論軍裝或便服，總是整整齊齊，乾乾淨淨，非特其本人如此，其夫人也和他同樣的整齊樸素，毫無奢華之氣。

關於領袖的飲食，是最簡單最樸實沒有了。平常吃飯，總是幾樣清潔而素淡的菜，並無山珍海味，在宴客時，也不常用豐滿的酒席，總是常常吃的幾樣菜。居住的地方也是很簡單的，在南京時並非住的崇樓傑閣，只是極普通的幾間房子，如果到外省巡視或督戰的時候，也只是住在極平凡的房子中，從不講究居住上的舒適。至於行，因爲領袖日理萬幾，或是爲了保守機密起見，所以有時坐火車，有時坐兵艦，有時則乘飛機，並無一定。

領袖的生活上更有幾種特點：第一就是努力讀書，這一點是極像 總理的。他雖在軍書旁午，

或萬端待理的時候，每天仍必抽出時間來閱讀書報，尤其在旅行的時候，常常在車上，船上，甚至飛機上面，都在閱書或辦公。大公報記者今夏在廬山時，曾親見領袖自牯嶺下山時，坐在轎子中孜孜閱讀，由此可知領袖勤讀之一般。

領袖生活上的第二特點是辦事敏捷而確實。所有緊要公事，從不積壓，有時早晨呈上去的，下午就可得到批覆，打破了以前一班舊官僚舊軍閥的延宕積壓的惡習。再辦的事情，批的公事，又是十分確實，總是有極明顯的辦法，毫無因循或猶豫不決的地方。

### 第三章 怎樣領導我們抗戰

【九一八和二二八】中國自從在領袖領導之下完成北伐，掃蕩軍閥，方期從事建設，一步一步地向現代國家的道路邁進；不料霹靂一聲，於民國二十年爆發了九一八事變，日本在數天之內侵占我東北三省，復占我熱河，空前國難，使我國的和平建設受到極嚴重的打擊。

自從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我全國上下，莫不同聲呼號，悲憤填胸，我領袖蔣委員長也於十月十二日的國府紀念週上發表了嚴正的談話：

『日本此次出兵，佔領我遼吉兩省，全國同胞，立刻一致起來反抗，不僅長江一帶如此，即最南部的廣東人民的表示，也十分激昂。這種全國一致的精神，真是衛國的至寶，比什麼力量都大。照上述理論看來，現在我們的軍備武力，雖然不如日本，但因為我們人民知識程度提高，所增加的衛國的力量，實在足以保衛我們國家的存在。這種精神的表現，決不是軍國主義的國家所能壓倒的。所以此次事件，固希望能夠和平解決，但若萬不得已而須以武力自衛，就必定可以得到最後的勝利。』

我們必要爲擁護國家民族的生存，維持公理人道的尊嚴，堅持到底，決不屈伏。全國國民總力量的表現，不但不爲敵人所畏嚇，而且要爲世界公理，國際公法，來盡其所應盡的責任。我們有堅忍的力量，無論異族用什麼陸海空軍的暴力，來壓迫我們，我們全國仍能以極悲痛沉着的精神，抵抗此莫大的凌辱。」

在事變發生以後，領袖就有這種嚴正的表示，將我國的立場說得十分明白，就是說我們是需要和平的，願意用一切方法來求和平，但是我們國家民族的生存與利益是必須保全的，如果超過了這個限度，我們就一定起來「抵抗此莫大的凌辱。」因此我們一方面作種種必要的措置和準備，同時就將日本侵略我國的事實提交國際聯合會，想由國際的力量來求得中日問題的解決。

但是國聯的力量十分薄弱，不能起來阻止日本的侵略，而列強之間（尤其是英美）也因利害的不一致，對於遠東問題不能採取一致的步驟，因此使兇惡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兇燄更爲高漲，在東北方面日益擴大其侵略範圍，同時更在上海方面藉口中國抗日運動，向上海市政府提出無理要求，市政府爲委曲求全起見，於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接受日方的要求，不料即於當

天晚上日本駐在上海的海軍陸戰隊即向閘北駐軍攻擊，於是有名的一二八的抗戰就發生了！

當時駐防上海的軍隊爲十九路軍，在戰事發動以後，我領袖立即調派第五軍張治中部全軍加入淞滬作戰，這二支軍隊以英勇的姿態，不屈的精神，給與敵人以莫大的打擊，殲滅其精銳部隊無數。日軍在上海，始則由其海軍陸戰隊司令鹽澤大言不慚，謂於四小時內，即可占領閘北，解除中國軍隊的武裝，不料戰事發生以後，不要說四小時，一直打到四百小時也沒有踏進閘北的土地，而且屢戰屢北，向其國內乞援四次，指揮的將領由鹽澤而野村，而植田，而白川，由少將而中將，而大將，先後凡四易主將，參加作戰的軍隊有海陸空軍十萬以上，我軍在上海抵禦暴日凡三十三天，後因敵人乘我瀏河空虛抄襲後路，以致我軍不得不退出上海。以後由英美諸國的調停，締結了淞滬停戰協定。

一二八上海戰爭，表示我民族武士的英勇，給予日本帝國主義以嚴重的打擊，後來的退出上海，固然由於瀏河失守的關係，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爲當時國內尙未團結，指揮不能統一，以致所有軍隊不能任意調動。



以後雖在各處發生了不少的抗敵自衛戰爭，如馬占山在黑龍江的抗戰，李杜及蘇炳文在黑龍江西部呼倫貝爾的抗戰，以及熱河長城各口的抗戰，但終因全國的力量不能集中，國內尙未能一致對外，所以都先後失敗了。

【抗戰必須有準備】 領袖見到這種種事實，就痛切地感到：非充實國力，無以圖存；非完成統一，無以禦侮。於是他在「充實國力」及「完成統一」這二個大目標之下，埋頭苦幹，努力進行。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加緊侵略，一方面隨時抵抗，同時作不斷的交涉，在不喪失主權的條件下，用最大的努力來忍耐，以求暫時的和平。當時國內民氣激昂已極，大家均願立即與暴日決一死戰，因此有一部分人對領袖發生誤會，以為領袖不願抗戰，領袖都一笑置之，從不和他們計較辯論。在那種內外夾攻的情勢之下，領袖始終抱定堅固的信心，一貫的主張，認為在國力未充和統一未成的時候，急於和暴日作戰，那一定加速中國的滅亡。他甯願忍受一時外界對他的誤會和怨謗，決不願將整個國家整個民族作孤注之一擲，而作中華民國歷史上的罪人。

領袖雖然認為中日終於不免一戰，但時期如果等得久一點，中國就可多準備一點，國力更充

實一點，國際的形勢或許可以更有利一些，因為中日間不戰則已，一戰就是一個長期的戰爭，決不是幾天幾個月可以了的，中國如無較好的準備，在短時期內即呈崩潰，則國際形勢的是否轉為有利於我，很難臆斷，而我國的前途也就不堪設想了！

【長期抗戰纔有利】 領袖在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江西南昌總部紀念週時曾說：『我們現在抗日，即對日寇作戰的問題，決不是幾天或幾個月可以完結的，一定是要長期抵抗，只有長期抵抗，我們國家纔有希望。如果我們以現在所有的部隊，統統加到長城一帶陣線上去求決戰，這一戰決下來，當然是我們失敗！因為現在時代，無論如何，他的武器比我們精良，技術比我們高明，我們在最短期間，是無法補救這二個重大缺點的。還有，我們如果像現在這樣軍情要來和他作一次殲滅戰，那麼，一仗打下來之後，我們後面，再沒有部隊可來增補，決不能作繼續不斷的長期抵抗！我們全國的戰鬥力，既經被這決戰完全消滅之後，那就無法來作長期抵抗。那麼，敵人不僅是要佔領平津，勢且長驅直入，凡鐵道線所通的與他們騎兵所能到的任何地方，凡是我們國家政治經濟交通的重要地區，都要被他佔領封鎖。他只要配備相當的兵力，就可來控制我們全國。那時，我們整個的國

家生命，就要滅亡。所以我們如果採取一線配備與決戰的抗日計劃，即所謂孤注一擲，那就永無復興之望了。因此我們現在對於日本只有一個法子，就是作長期不斷的抵抗！他把我們第一線的部隊打敗之後，我們再有第二線的部隊去補充；他把第一線的陣地突破以後，我們還有第二線陣地來抵抗他；這樣一步一步復一步的兵力，一線復一線的陣地，不斷地步步抵抗，時時不懈，這樣的長期苦戰，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自蘆溝橋事變以後，中央所取的國策，明明就是領袖一貫的主張。

領袖深感責任之重，決不能輕舉妄動，唯有刻苦奮鬥，以充實國力及完成統一為禦侮救亡的先決條件。

【發起新生活運動】 充實國力是分二方面來進行，一是關於精神建設方面的，即發起新生活運動，一是關於物質建設方面的，即發起國民經濟建設運動。

新生活運動是於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在南昌發起的，領袖曾說發起新生活運動的意義云：『我們要改革社會，要復興一個國家和民族，不是用武力所能成功的，要如何纔可以成功呢？簡單的講，第一就是要使一般國民具備國民道德，第二就是使一般國民具備國民知識。』又說：『務使

一般國民的食衣住行統統能合乎禮義廉恥，如此，我們的社會纔容易進步，國家和民族纔可以復興！

在三月二十六日南昌行營紀念週時講「再解釋新生活運動」時說：『現在的新生活運動，乃是要使一般國民，個個人所能知，所能行的日常生活，要以禮義廉恥為基礎，而照着我們所提倡的「整齊」、「清潔」、「簡單」、「樸素」和「迅速」、「確實」這六項運動為標準，隨時隨地來身體力行。』

二十五年二月在新生活運動二週年紀念日時，領袖又將新生活運動的目的解釋如下：『（一）我們現在新生活的目的，就是要將不知禮義、不明廉恥的「非人」的生活，變為明禮義，知廉恥的「人」的生活，要將嫖賭鴉片等腐敗污穢的生活，變成功為現代「人」的生活，如此纔可與現代的人和現代的各國並駕齊驅。（二）新生活運動，直言之，就是要使全國國民的精神和行動現代化，我們知道現代是科學的時代，所謂現代化者，就是要科學化，組織化，和紀律化，概括的說就是「軍事化」。』

自從新生活運動發起以後，全國響應，而日一新，世界各國也都評爲「中國復興的象徵。」

【精神建設的效果】 這種精神建設的效果極爲巨大，使我古老的國人的生活完全革新，精神突然振作，使每一人都能「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建設復興民族的精神的基礎。推行以來，僅僅三年，國人的生活，社會的風氣，却與從前大不相同了。在個人生活方面所表現的，就是食衣住行都簡單樸素，迅速確實，合於「禮義廉恥」的標準；在社會方面所表現的，都能守秩序、守紀律，減少了許多紊亂的現象，減少了許多違法的事情。這種國民的精神建設運動，可說就是現在全國軍民抗戰的基礎，也是我們民族將來可以得到最後勝利的保證！

自從抗戰發生以來，我們大家都知道，我們的武器不如敵人，但我們的精神，我們的勇敢，却較敵人勝過萬倍，每個士兵都把「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以血肉之軀抵抗敵人的大礮飛機和機械化的銳利武器，前仆後繼，勇往直前，在南北二大戰場上發生了不知多少的可歌可泣的壯烈故事，這種故事，都是我們每一個戰士用血所寫成的。現在我們可以確信：精神可以戰勝物質！我們看到自從抗戰發生以來，兵士的勇敢善戰，不屈不撓，民衆的熱忱後援，堅苦奮鬥，這種軍民打成一片

的爲民族解放的團結精神，可說是中國自有歷史以來所未見的！全國軍民爲何有這種壯烈的犧牲精神呢？那我們可以說實在是得力於這三年來新生活運動的推行！所以新生活運動實可說是一種民族奠基的運動！

【經濟建設的運動】但是，專靠精神，而毫無一些物質上的準備和建設，當然也是不成的。所以領袖在發起了新生活運動以爲精神的建設以後，復於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十日發起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以爲物質建設的基礎。

領袖曾於二十四年雙十節發表的「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之意義及其實施」的導言中說：『中國今日根本之危機，全在經濟之殘破，以致國民生活日益困窮，而民族之命運，亦因之岌岌危殆，不能生存於二十世紀之今日。故目前我國唯一重要之問題，乃爲如何挽救此已就崩潰之國民經濟，而使人民獲得相當之生活；及如何解決貨棄於地，而民困於野之矛盾可恥的現象，而謀國民經濟之發展。因此認爲今日須有一種運動，繼新生活運動之後而起，即國民經濟建設運動是也。』又說：『國民經濟建設運動，與新生活運動，二者實相爲表裏，故必須相輔而行。蓋新生活運動爲民

族的，爲修身的，着重於道德與精神方面爲主，實爲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之體。而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爲民生的，爲生產的，着重於行動與物質方面爲主，實爲新生活運動之用。新生活運動，所以奠立民族之精神的基礎；而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則所以充實民族之物質的基礎，故二者實缺一不可者也。』

在這二節裏，我們就可明白知道領袖所以發起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的意義，以及和新生活運動的關係。領袖更具體的訂定：「盡人力，闢地利，均供求，暢流通，以謀國民經濟之健全發展」爲總目標，又訂立各項實施要項：（一）振興實業，（二）鼓勵墾牧，（三）開發礦產，（四）提倡徵工，（五）促進工業，（六）調節消費，（七）流通貨運，（八）調查金融，並擬（一）調查統計，（二）集中人才，（三）研究設計，（四）訓練人才，（五）宣傳指導等各種工作步驟。

自從運動發起以後，全國各實業家一致響應，各界人民也都擁躍參加，政府更釐訂詳細而具體的方案，並督促地方政府一致推行。

【二大運動與抗戰】 我們這種復興民族的奠基工作，當然要爲敵人所顧忌恐慌而作種種

的阻礙，我們發起新生活運動，敵人就在東北華北廣設烟館妓院，公開販毒，以毒化我們的民族，墮落我民族的志氣；我們發起國民經濟建設運動，敵人就高唱「中日經濟提攜」並極力促使華北特殊化，企圖將我國民經濟變成殖民地經濟。我國在敵人的種種陰謀毒計之下，仍舊不顧一切，努力推行，最近二年來的提倡國貨，扶助國貨廠商，調劑金融，改革貨幣，都是比較週知的事實。自從抗戰發動以來，我們後方的金融，仍舊安如磐石，絲毫沒有混亂恐慌的現象，可說都是二年來推行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的結果。

自從九一八事變以來，領袖深知國家病源之所在，埋頭苦幹，充實國力，忍受敵人的欺凌壓迫，及國內一部分人民的怨懣，發起此二大運動，驟看之，似與抗戰無關，但在抗戰已經數月的現在再來加以分析，則深知我們的抗戰如果沒有新生活運動及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以為基礎，那麼現在真是要不堪設想了。領袖曾說過這樣的話：『我們所有報仇的敵愾，絕對不能暴露出來，一暴露出時，我們便不能和仇敵作戰，所以我們所有吞敵的氣概，非到最後的時候，是不能拿出來。』現在是已到最後的時候了，所有吞敵的氣概當然是可以拿出來了，但我們回想到當時領袖的一片苦



心，以及堅苦卓絕，埋頭苦幹的精神，我們應當怎樣來表示我們的敬意呢？

【和平統一之完成】 領袖一方面發起新生活運動及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以充實國力，準備和敵人作長期而堅苦的奮鬥，同時，即努力於國內統一之完成。

中國自民國以來，連年內亂，兵禍頻仍，以致國力消耗，外侮乃乘機而入。所以領袖認為要抵禦外侮，必須先求國內的統一團結，國內能統一團結，方能共同抵禦外侮。領袖在二十五年七月十三日的中央紀念週上講：『政令統一，是對外抗爭的根本要件，軍令政令不統一，絕對不能對外。』又說：『就革命的方略來說，正唯有外敵的壓迫，中央更不得不先澈底肅清內亂，否則一般漢奸匪徒，更要挾寇自重，國家更無安定復興之期。』又說：『凡是一個國家要獨立存在於世界，必須保持精神上立國的要件，和統一國內力量的紀綱。』由此可知領袖對於統一所抱的決心，同時也就是對於抗戰所抱的決心。

關於統一救亡，在中國國民黨五全大會的宣言中曾說：『救亡圖存，有賴於國力之充實，而欲求充實國力，則必先謀全國真正之統一和平，中央與地方澈底樹立互信共信之基礎，推誠扶掖，同

循政治正軌，實爲達到和平統一之惟一途徑。」因此領袖數年來的努力完成統一，也就是執行大會的決議。

自從九一八後，國內方面雖然接連發生了閩變，兩廣事件及西安事變，但我們的領袖總是以大公無私的精神，亟盡一切和平的方法來解決內政問題，來完成統一的大業。除了萬不得已而用兵外，對內在維持綱紀的條件之下，總是以和平解決爲唯一的目標。因爲領袖深知如果對內消耗一分實力，即對外減少一分實力。在數次的事變中，除了對於閩變不得已用過一次很短時期的兵力外，其餘如兩廣事件，西安事變，都是用和平方法來解決，未曾用過兵力。

直到全面抗戰發動的前後，中國統一的大業可說已由領袖完全奠定了。卽和國軍血戰十年的所謂共產黨的「紅軍」也願意取消蘇維埃政府，放棄階級鬭爭及武裝暴動，改編紅軍爲國民革命軍，在領袖的領導之下共同參加對日的抗戰了！

【容忍之最大限度】但是，領袖雖然對外極力忍耐，求暫時的和平，以便努力充實國力，完成統一，但此忍耐也是有限度的，並不是毫無止境的忍耐，那麼對外忍耐的限度是如何呢？領袖在五

全大會第四次會議演講對外關係中說：『苟國際演變，不斬絕我國家生存民族復興之路，吾人應以整個的國家與民族之利害爲主要對象。一切枝節問題，當爲最大之忍耐，復以不侵犯主權爲限度，謀各友邦之政治協調。以互惠平等爲原則，謀各友邦之經濟合作。否則卽當聽命黨國，下最後之決心。中正既不敢自大，亦決不甘自逸。質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不輕言犧牲。以個人之犧牲事小，國家之犧牲事大。個人之生命有限，民族之生命無窮故也。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犧牲有犧牲之決心，以抱定最後犧牲之決心，而爲和平最大之努力，期達奠定國家復興民族之目的，深信此必爲本黨救國建國唯一之大方針也。』後來領袖又在五全大會的二中全會中報告容忍的最大限度，有更具體的說明：『我們臨到這個國難嚴重關頭，應當不惜犧牲來禦侮救亡，這不僅是我們中央委員抱這種心理，就是全國的小學生也都念念不忘這一句話，可以說凡是中國人，誰都知道要救亡，誰都知道要禦侮。』又說：『任何國家要來侵擾我們領土主權，我們絕對不能容忍，我們絕對不訂立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協定，並絕對不容忍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事實。再明白些說，假如有人強迫我們欲訂承認偽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

時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後犧牲的時候，這是一點。其次，從去年十一月全國代表大會以後，我們如遇有領土主權再被人侵害，如果用盡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這個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們國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這就是爲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到這時候，我們一定作最後之犧牲，所謂我們的最低限度，就是如此。」

領袖發表了這篇嚴正而明朗的報告以後，凡以前不能對領袖有深刻的認識者，方纔知道領袖確有抗戰禦侮的決心，確有最後犧牲的決心，因此全國上下在領袖領導之下團結得愈爲堅固，步調也愈趨一致。只等待領袖的命令，就可揭開偉大的抗戰之幕。

【敵人的加緊壓迫】我們國內越團結，當然敵國越恐慌，尤其看到我們國力的日漸充實，對於領袖擁護尊崇之熱烈，更看到我們在西安事變的時候，那種擁護領袖的情緒之熱烈，以及全國團結一致的表現，使敵人越發恐慌，因此其侵略的魔手，也就較前更爲急進了！

同時，我國國力日漸充實，民氣也日益激昂，而政府對外的方針也日漸加強，日本還想用「和平」的方法來侵奪中國的領土主權，一方面在華北加強特殊化的工作，同時在南京卻由日本駐

華的川越大使從事交涉，口裏唱着「中日親善」，手裏執着廣田滅華三原則，敵人雖然用盡了種種威脅利誘的手段，但我政府終不爲所動，保持領袖在二中全會中所報告的限度。敵人無可奈何，只得將外交工作暫時擱置。但敵人到底不能忍耐，不能看着中國覺醒起來，團結起來，所以不久，又在綏遠發動了大規模的侵略戰爭。不料這次敵人也受到了極大的創傷，一發動的時候，就遇到綏遠傅作義將軍的堅強抵抗，中央又立刻調派湯恩伯將軍率部前去加入作戰，同時我們的戰略也較以前大不相同，以前幾次局部的戰爭都是只採守勢，這次卻採的攻勢，因此一戰就殲滅進犯紅格爾圖的偽軍，再連克百靈廟大廟，直搗日偽軍的巢穴，給敵人以迎頭猛擊，而偽軍金憲章、石玉山等更紛紛反正，打破日本以華制華的夢想！

我國自從在綏遠得到了偉大的勝利以後，全國民氣愈益激昂，抗戰的情緒也愈益熱烈。日本的財閥方面雖仍想用「和平」方法來侵吞中國，提倡「中日經濟提攜」，組織「中國經濟考察團」等等，但國人對之極爲冷淡，大家認爲政治問題尙未解決，談不到經濟提攜，因此兒玉調查團等一行乘興而來，敗興而歸，除了一些應酬之外，完全沒有得到什麼結果。

中央方面鑒於中日間情勢的嚴重，一方面加緊準備，作各種必要的措置，同時仍舊用最大的努力，以保東亞的和平！

【盧溝橋事變爆發】日寇既知「和平」侵占之夢業已絕望，乃不得不發動大規模的侵略戰爭，以滿足其獸慾！自從去年起，日本就在華北大規模的增兵，並將各部隊一律採取戰時編制，配置各種機械化的部隊，日寇這種露骨的侵略準備，終於本年七月七日爆發了盧溝橋事變！

我國自從九一八事變以來，忍受日寇的侵略已達六年，至此實已忍無可忍，如再含辱忍耐，那就要妨礙我們領土主權的完整，也就是要超過二中全會中領袖所說容忍的限度，因此，領袖在七月十七日的廬山談話會中發表了嚴正而明白的宣示，表明盧溝橋事變的能否和平解決，即是我們最後關頭的界線。在談話中有最重要的幾句：『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唯有「犧牲到底」的決心，纔能博得最後的勝利，若是徬徨不定，妄想苟安，便會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這是表示我們對於抗戰的決心。又說：『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所以政府必特別勤慎，以臨此大事，全國

國民亦必須嚴肅沉着，準備自衛。」這是領袖號召全國民衆共同起來抗戰的嚴肅的揭示。

日寇既已決心滅華，故蘆溝橋事變當然不是偶發事件，而是其預定的陰謀，所以在事變發生以後，日寇即以大軍猛攻二十九軍，二十九軍當即奮勇抗戰，惟終以事前地方軍事長官的猶豫，缺乏了準備，以致我北平故都，於七月二十七日陷落。當由領袖於七月二十九日發表對新聞記者的談話，其第二節云：『自蘆溝橋事變發生，余在廬山談話會，曾切實宣告，此事將爲我最後關頭之界限；並列舉解決此事之最低立場，計有四點，此中外所共聞，絕無可以更變。當時余言，余不求戰，祇在應戰，今既臨此最後關頭，豈能復視平津之事爲局部問題，任聽日軍之宰割，或更製造傀儡組織。政府有保衛領土主權與人民之責，惟有發動整個之計劃，領導全國一致奮鬥，爲捍衛國家而犧牲到底，此後決無局部解決之可能。國人須知我前次所舉之四點立場，實爲守此則存，逾此則亡之界限，無論現時我軍並未如何失敗，即使失敗，亦必存與國同盡之決心，決無妥協與屈伏之理。總之：我政府對日之限度始終一貫，毫不變更，即不能喪失任何領土與主權是也。我國民處此祖國之存亡關頭，其必能一致奮鬥到底，余已決定對於此事一切必要措置；惟望全國民衆，沉着謹慎，各盡其職，共

存爲國犧牲之決心，則最後之勝利，必屬於我也！』

【八一三上海抗戰】領袖重申對日抗戰的決心以後，中日間的大戰，已是一觸即發。但自平津相繼失陷以後，中間有十餘天的時間，好像十分沉悶，不見中央有何積極的舉動，其實那時中央是在日夜的積極準備，只是不能向人民宣露而已。

自從北方的大戰開始以後，上海的形勢也一天緊張一天，而日寇的軍艦及軍火更不斷地開來，終於藉口虹橋事件，爆發了八一三的上海戰爭，至此，我全面抗戰的形勢業已形成。

日寇在上海發動抗戰，目的是在牽制我們的兵力，分散對於北方的注意，也是分散國際間對於北方的注意，他這種陰險惡辣的計謀，馬上被我們英勇的抗戰所消滅了！日寇在上海既不能達到「速戰即決」的計畫，而北方也絕未減少我們的注意，不斷地增援，最近且已採取進攻的方略，而形勢業已好轉。日寇計不得逞，只有施行其最殘酷最卑劣的手段，轟炸我全國各城市，慘殺無辜民衆，並封鎖我海岸，騷擾我沿海各地。但日寇此種橫暴無恥的國際強盜的行爲，卻絕未減弱我們抗戰的力量，相反地，反而增加我全國民衆的同仇敵愾之心，人人均願與暴日決一死戰。日寇欲使



我國「屈膝」的夢想，必永無實現之一日！

我領袖自從全面抗戰發生以後，曾歷次向新聞記者及全國國民發表抗戰決心的宣示，如在接見外報記者時說：『中國此次抗戰，不僅在中國本身之存亡，且亦即為九國公約及國聯盟約伸正義，因此公約及盟約之簽字國，應對中國之奮鬥加以援助，在公約及盟約等有效期間，美國不應考慮中立法。』又說：『中國抵抗日本之侵略並無時限。在日本侵略繼續進行之中，或在九國公約及國聯盟約尚未實施之前，戰爭勢亦不止。中國已不能容許日本軍隊之以壓力加諸中國，故戰爭時期之久暫，全視日本和列強之態度，凡一國家苟不尊重國際間人道之規律者，必不能持久。』

在接見美聯社訪員時，領袖又重申中國抗戰之決心：『我人現正奮鬥，並將繼續奮鬥，以期達到日本軍隊完全撤退之目的，俾吾人可繼續和平建設之計畫。吾人自衛之決心，始終一致，雖至戰上之最後一人，領土之最後一寸，亦不稍變更初志，非俟正義確立，條約重伸其尊嚴，吾人之抵抗，決不停止！』

【領袖訓示我國民】 領袖在十月十日國慶紀念日，更發表對全國同胞的廣播演講詞：『現

在我們是意志統一，精神團結了，由於我們統一團結，使將士們的犧牲，發生加倍的力量，由於我們統一團結，使世界各國，對我們生出無限的同情和贊助。我們更要知道真正的勝利，必從持久苦鬥中去求，決不可以僥倖而得。國際的同情，足使我們興奮，但決不可以有所依賴，我們必先自助，他人始能助我。……我們要從抗戰中磨練自身，改造民族，來創造國家新生命。……我們不但要始終保持統一，並且要繼續的鞏固團結，我們已經在抗戰開始時證明民族團結，國家統一的力量偉大，我們更要在抗戰中間表現我們的統一，加強我們的團結，我們要做到進退生死，共同一致，安危禍福，始終與共。在民族最高利益之下，絕對的尊重紀律，服從命令，博得最後的成功，纔對得起已死將士和先烈，纔不辜負友邦的同情。……矢忠矢勇，雖僅餘一兵一卒，亦必奮鬥到底。……我們必須犧牲個人的一切，來求得國家民族永久的幸福。」

我們聽了領袖的這篇訓示，感到多麼悲壯，多麼興奮！領袖一方面表示抗戰到底的決心，一方面希望全國同胞一致奮起，互相團結，堅苦奮鬥，以爭取最後的勝利！

現在我國抵抗日寇侵略的偉大的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是已在進行中了，而且一天天的發

展起來，我全國同胞對於我們的抗戰領袖——蔣委員長必須有明白而確切的認識，我們一致團結在領袖的週圍，造成攻不破的血肉長城，遵照領袖的命令，服從領袖的指揮，堅持到底，抗戰到底，最後的勝利是一定屬於我們的！

我們的抗戰領袖萬歲！

中國國民黨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





中華民國玖拾年柒月 陸日贈送

中華民國



(本書校對者李家超)

國家圖書館



002323732

